

向陈云学习

XIANG
CHENYUN
XUEXI

齐卫平 房 中 主编



向陈云学习

XIANG
CHENYUN
XUEXI

齐卫平 房 中 主编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侯俊智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陈云学习/齐卫平,房中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1-014975-2

I. ①向… II. ①齐…②房… III. ①陈云(1905~1995)-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7751 号

向陈云学习

XIANG CHENYUN XUEXI

齐卫平 房中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7-01-014975-2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向陈云学习坚守信念

1. 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翘辫子” /2
2.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质是一种思想斗争 /7
3. 知行合一，捍卫共产主义信仰 /10
4. “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 /15

第二章 向陈云学习科学思维

1. “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22
2.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27
3. “交换、比较、反复” /34

第三章 向陈云学习勤奋好学

1. “挤时间来读书” /44
2. 学习要有正确的方法 /50
3. “活到老，学到老” /56

第四章 向陈云学习工作方法

1. “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62
 2. “善于牵住牛鼻子” /71
- 

3. “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 /77

第五章 向陈云学习经济才能

1. “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86
2. “瓜皮帽”、“踱方步” /93
3. “我是算账派” /99

第六章 向陈云学习稳健作风

1. 清醒认识中国国情 /110
2.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116
3. “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122

第七章 向陈云学习治党方略

1.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132
 2. “支部是党的基础和堡垒” /136
 3.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
生死存亡的问题” /141
 4. “只有民主，才能集中” /145
- 

第八章 向陈云学习干部管理

1. “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154
2. “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159
3. “我一个干部也不放手” /163
4. “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167

第九章 向陈云学习心系群众

1.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176
2. “蔬菜和副食品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 /182
3. 经济的最后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 /189

第十章 向陈云学习战略眼光

1. “必须搞好计划生育” /198
2. “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 /204
3. “保护环境、防患于先” /211
4. “我们还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 /217

后 记 /225



第一章

向陈云学习坚守信念



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他始终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渝、执着追求。他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中选择、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并坚守终身；他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争中，不断加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他坚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捍卫共产主义信仰；他求真务实，勇于自我批评，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始终如一。

1. 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翘辫子”

陈云说，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对于自身来说，陈云终身将为共产主义奋斗作为自己的理想。

陈云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中选择、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的。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后，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宣布总罢课和总罢市。上海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以陈云为委员长的商务印书馆罢工执行委员会，指挥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罢工胜利后，陈云由董亦湘、恽雨堂介绍，于1925年八九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曾回忆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指出，“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1〕}对于入党后的思想转变，他回忆说：“我自觉入党是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

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2〕}“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以后，大家才有饭吃。”^{〔3〕}其后，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陈云担任沪中区委委员，依然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他常对商务工友说这样一首打油诗：“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这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气概。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但陈云依旧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在全总一次会议上针对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指出：“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4〕}

延安时期，陈云倡导为共产主义奋斗。1938年6月在纪念瞿秋白同志的讲话提纲中，陈云提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死了为止”。^{〔5〕}他还将其作为共产党员的首要标准提出，这一思想认识在1939年5月30日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将抗日战争背景下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指出“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具体来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事实上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先后多次应邀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青年干校等处作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培养革命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等问题的报告。在各校的讲课中，他常常紧扣当前抗日形势的最新发展和实际情况，结合党的历史以及身边发生的事实，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据一位老同志回忆，一次陈云在讲述如何在随时存在生命危险的斗争环境中锤炼并保持革命的坚定性问题时，他突然指了指窗外的延河水，回头对同志们讲：“大家都知道，延河里有一块大石头，几百年来，经历了多少次大水，都没有被冲走。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像这样的大石头，要有革命的坚定性，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经得起千锤百炼，不惧怕白色恐怖和各种恶劣环境，也不为糖衣炮弹、阿谀奉承所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1939年春，陈云到马列学院三班讲课时说，共产党员“必须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奋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就是死的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讲就是‘翘辫子’”。^{〔6〕}那么怎么叫到底，怎么叫不到底。他说，陈独秀、顾顺章、张国焘就是没有到底。再如监狱叛变，战场逃跑，受金钱美女利诱等，总之只想个人得失，就不能到底，而一些先烈身陷囹圄，惨遭酷刑，面临死亡而坚贞不屈，最后从容走上刑场，慷慨就义，忠诚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就是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建立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第一阶段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1951年7月1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一文。在文中，陈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28年奋斗历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新中国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我国人民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7〕}陈云还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大家富裕的可能。”^{〔8〕}可以说，共产主义制度是最为优越的制度，只有制度建立起来了，才能保障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1962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基调性讲话，会议内容主要集中在批评包产到户。此前，陈云曾向毛泽东建议用分田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9]后来，陈云听到该消息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于若木回忆说：“他不沮丧，不生气，只是对我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境。”^[10]此后，陈云政治上遭受冷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场浩劫中，陈云也未能幸免。8月13日，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谢富治再次向陈云发难，否认陈云在经济调整时期的重大功绩，并公然诬蔑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11]在这些反动分子的诬蔑下，一时间“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一顶顶大帽子扣在陈云头上。

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到江西“蹲点”，直到1972年4月才回到北京。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因为错误的批评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反之，他多次召开各种座谈会，参加生产调度会和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评比会，到外面调研等。一次，在金工车间划线班，有的青年工人问他：“怎样才算革命到底？”陈云解释道：“没有革命到底的时

候。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不能算革命到底了。比如你有了一顶帽子，后来看到一顶新的，比自己原来的好，又拿了一顶，这就有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觉悟高低的问题。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一个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除此之外，陈云在逆境中坚持研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叮嘱自己的儿女“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12〕

历史证明，无论是领导工农运动，还是做秘密工作，无论是领导党的组织工作还是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身陷逆境，陈云同志始终“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13〕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将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然而，社会上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过时的言论也越来越多，有一次陈云专门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14〕他还针对社会上有人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15〕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有人公开宣传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对于这一观点，陈云在同李瑞环谈话时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

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史实后，指出，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由此可见，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陈云同志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16〕。

2.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质是一种思想斗争

毛泽东曾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7〕因此，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要进行思想斗争，要克服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增加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陈云也指出：“各个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同，还有剥削阶级的影响，所以对一切不好的倾向必须斗争，斗争是为了教育全党，并帮助一些同志克服他们的毛病，挽救一些人。”〔18〕

陈云在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过程中，多次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1927年4月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和青帮流氓在租界帝国主义当局配合下，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并以武力胁迫骗缴纠察队的武器。上海总工会发布紧急罢工命令，号召发动总罢工。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也被强行解散，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上海被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陈云担任沪中区区委委员，依然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九十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动员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陈云即被派到青浦章练塘去搞农民运动。陈云的舅父得知此消息后，在陈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道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陈云后来回忆说：“犹豫三天”，“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也

是进行思想斗争的三天。然后，他毅然决然地表示：“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以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19〕}此后，陈云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再也没有动摇过。

进行思想斗争就必须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分裂党、谋取党和国家重要领导权的事件震惊全党，接着全党开展了怎样防止党内出现野心人物、出大乱子的问题的讨论。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陈云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中明确指出，对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有了政权的党，更容易滋生军阀主义的思想”，再加上我们党仍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就是在阶级消失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因此党内存在坏倾向是必然的，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而针对当时党内情况，陈云则尖锐地指出：在不少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与自己的错误倾向作斗争”^{〔2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支持下，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是，在一些重大原则性的思想理论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当时社会上主要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潮，一种是“左”的思潮，主要表现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不理解，认为改革开放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要表现为把目光转向西方，企图从西方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主张经济、政治、文化都向西方学习。毋庸置疑，这两种思潮都是错误的。邓小平指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21〕}陈云也指出，要

“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参与制定并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然而这一时期，在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系问题上，往往容易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否定后者，把二者对立。为此，陈云在对各种“左”的思潮进行思想斗争时，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2〕}“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仍然是在搞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23〕}“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24〕}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一些共产党员忘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情况，强调指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陈云始终保持着警觉，他多次提醒全党“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因为“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他还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对此，为了增强全党抵御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能力，陈云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

心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使全党同志坚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3. 知行合一，捍卫共产主义信仰

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陈云既在理论上倡导和信仰共产主义，又在行动中探索、发展和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尤其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对党中央的捍卫，表现了一名老革命家的坚定信仰。

1935年，中共中央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1月9日，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进城前，中共中央临时组建遵义警备司令部，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积极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建立地方武装游击队，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群众。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八十号二号楼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李富春等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等人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出席了遵义会议。在这个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为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投了重要的一票。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其后，他在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也指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25]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陈云在关键时刻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捍卫，也为

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重任。然而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此前，华国锋曾对宣传口指示：目前主要是批判“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还要有关同志把“两个凡是”的观点写进三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提纲中去。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起始，中央的主要领导便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陈云不顾压力，从党的利益出发，向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在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又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26]与此同时，王震在小组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负责会议简报的同志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要求陈云按他们的意见对书面发言进行删改，遭到陈云严正拒绝。结果，这个发言未能在简报上刊出。但由于陈云、王震的发言，触及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件大事，因此在会议上不胫而走。会后，许多老同志纷纷要求中央正确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面对党内外的压力，在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重大突破，